

毛詩序再檢討

高 球 光

毛詩關雎篇的前邊，有限長的序。從「關雎后妃之德也」起，至「用之邦國焉」止，世稱小序。從「風風也」起至末止，世稱爲大序。（註一）此外每詩的前邊也有個序，普通都稱爲小序。（註二）大序是總論全詩的大義的；小序是論每篇詩的意旨的。普通的傳說，大序是子夏作的；小序是子夏公合作的。（註三）這個傳說，經過唐韓愈，宋鄭樵及朱熹的攻擊，已極動搖。又經清人姚際恒崔述的詳密指摘，詩序作者的傳說更形破碎。詩序已失去以前價值。因此現代研究詩經的人全捨序言詩。可是今天有幾位學者提出新問題，以爲那些人提出反對傳說的意見，大要是信賴後漢書儒林傳的話，故斷定詩序是衛宏作的。然而衛宏與馬融之父馬嚴，及賈逵等應該熟知。他們全未說衛宏作詩序，殊爲可怪。因之很懷疑范曄的話不可靠；又進一步，以鄭玄所說的爲真實。已冷的灰燼又復燃起，一千多年來爭訟案件，又提出上訴狀。這個訟案如果不解決，當然對於研究詩經有重大影響。我們整理古代文化，必求真實。我不揣冒昧，將前人今人對於毛詩序的反正意見詳加比較，然後判斷誰是誰非，讓這案件的真象大白於面前。

一 信仰詩序全部者的意見

沈重說：

「按鄭詩譜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註四）

隋書經籍志：

「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飾」。

陸德明經典釋文也說：

「孔子最先刪詩以授於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又說：

「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孔穎達毛詩正義說：

「詩三百一十一篇，子夏作序。」

邱光庭兼明書說：

「先儒言詩序並小序，子夏所作，或曰毛萇所作。明曰非毛萇所作也。何以知之？按鄭風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經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毛傳曰：『願其室家相樂也。』據此傳意，與序不同，自是又一取義也。何者？以有女如雲者，皆男女相棄，不能保其室家，卽縞衣綦巾是作詩者之妻也。既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願更得聊且與我爲樂也：如此則與序合。今毛以縞衣綦巾爲他人之女，願爲室家得與相樂，此與序意相違，故知序非毛作也。」……或曰：「旣非毛作，毛爲傳之時，何不解

其序也？」答曰：「以序文明白無煩解也。」

以上各家皆以為詩序是子夏作的。惟隋志主張有毛公衛宏潤色處。二說實大同而小異。這樣主張起始於鄭玄。他的根據是什麼呢？可能由於傳說加上自己的推測。他在南陔詩小序下曾經說過詩小序各篇合編單行，至毛公才分置各篇的前面。所以詩六篇亡佚；詩序還能保存。鄭氏從何處知道毛公以前已有詩序？和分在各篇的小序，是毛公安置的？也不過是自己的揣測，或者聽信傳說罷了。比較有根據的；還是邱光庭的言論；但是只能證明序不是毛公作的；不能證明序是子夏作的。（註五）

二程全書載程頤說：

「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安節問小序何人所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

毛詩集解載黃櫞說：

「大序之言，深得風雅之旨；而其所以滋後世之異論者，以其言辭重複，前後失倫耳。若吾夫子爲之必不若是也。意者吾夫子反魯刪詩之際，與門人弟子所以論詩者如此。而門人弟子若子夏之徒，集夫子之言，而冠於三百之首云耳。……小序國史之舊題。大序記夫子之言而非夫子之所作也。小序則漢儒之說或雜其間。」

范處義詩補傳說：

「詩有小序有大序。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小序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間有聖人之遺言」。「於詩則刪之，苟不據序之所存，亦何自見其興衰之由，而知其美刺之當否？」

王安石詩經新義說：

「詩序詩人所自製」，「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媵，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乎？」馬端臨經籍考，洋洋數千言駁擊朱子詩集傳。茲撮其主要對於詩序的意見如後：

「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繫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意者。而敘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置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宜因其一語之贅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爲之訓釋也。……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意旨，則自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於尙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

陳啓源毛詩稽古篇說：

「小敘傳自漢初。其後敘或出後儒增益；至首敘則采風時已有之，由來古矣。其指某

詩爲某君子某人作，皆師說相傳如此，非臆說也。」（註六）

以上數家，不但信序；且以爲是孔子作的，或國史作的，或者認爲詩人自敍，采詩時已經有了，全出在子夏以前。詩序的權威性，更見增高。但其錯誤，仍然是不可掩蔽的事實。

(1)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駁王安石詩序的主張說道：

「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按軒詩序茅昔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軒詩，不應不同若是。」

他這個批評，確洞中窺要。我們推衍他的意見，也可以說。若是詩序是孔子作的，或者是孔子以前的國史作的；古今文各家同出孔門，所講詩的旨義，應該相同。何故有時勢若水火呢？同時孟子與威丘蒙言詩時，爲什麼，不把這個極具權威的詩序拿出來；反而說「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從孟子這一番話，就可見他還不知道有詩序。說什麼子夏孔子國史采詩人作敍！這不等於癡人說夢嗎？

(2)像馬端臨這般人，總有一個誤會。以爲凡是主張詩序是後儒作的話，就是廢棄詩序。

廢序言詩，就不能瞭解詩意。不知朱子等主張廢序，因爲詩序作的不好。若是好的話，他絕不廢棄。我們看他的詩集傳的註子裏，不也是標明此詩是爲什麼而作的嗎？可見他並未主張所有的詩，不應該有序；而是主張壞序不應該留。

二 信仰詩序一部份者的意見

歐陽修詩本義，常脫離毛鄭成說而自出新義；可是他有時指出序的違失，也有時推崇序。他講：

「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姓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知也。………子夏親受學于孔子，宜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爲此言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頗多。」

歐陽氏以爲序不是子夏作的，是誰？已經不可知了。他作毛詩本義，有時遵從序，有時違背序；對於周南召南，糾正序處更多。

他又嚴厲地批評毛鄭二氏。他比前儒開明多；但尚未完全忘序。成伯瑜毛詩指說講：

「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東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其餘衆編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耳。」

蘇轍詩集傳說：

「孔子之序書也，舉其所爲作書之故，………未嘗詳言之也。非不能詳，以爲詳之則隘；是以常舉其略以待學者自推之。………今毛詩之序何其詳之甚也？世傳以爲出於子夏，予竊疑之。………孔子刪詩而取三百十一篇，今亡其六焉。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公之學，而衛宏所集錄也。………故予存其一言而已………。」

以上二人皆信小序之首句；蘇氏較成氏又更進一步，全以爲毛公只裁初句。蘇氏以後的程大昌，又想調和前人的糾紛。他在詩論中說：

「范蔚宗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

於世而鄭元作毛詩箋也。」其敍述傳受，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並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他很巧妙地以小序的首句爲古序，其餘爲衛宏序。既信舊論，又不棄今語，可謂善於立言者。其他的學者如嚴粲李樗等（註七）也是信從成蘇二氏的話，信任小序的頭一句，來解釋詩義。

總之從漢到宋以前，很多人依序言詩。無論信仰詩序的全部或一部，全是被序所拘束；把有生命的詩，變成死氣沈沈的教條！無怪朱子大聲疾呼道：

「小序之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不切于情性之自然。」「今但信詩，不必信序」（詩序辨說）。章如愚也憤慨地說道：

「俗學以爲出於子夏，妄者又直以爲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求之。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即已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嗚呼詩安得不亡乎！」（詩說）。胡適也說道：

「詩經到了漢朝真變成了一部經典，詩經裏面描寫的那些男女戀愛的事體，在那班道學先生看起來，似乎不大雅觀，於是對於這些自然的有生命的文學不得不另加種種附會的解釋。……明是一首男女的戀歌，他們故意說是歌頌誰，諷刺誰的，詩經到了這個時候！簡直變成一部聖神的經典了！」（談談詩經）

胡先生的話，不但痛快淋漓；且把漢人附會的原因說出，可以把信序的迷夢喚醒！

三 反對詩序、主張廢棄者的意見

唐朝的杜牧，作詩之序議，曾經說道：

「詩之序明作者之所以云，其辭不諱君上，顯暴醜亂之迹，帷箔之私，不是六經之志，若人云哉？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借之子夏。」

韓氏反對詩序的理由雖未充足；但斷定是漢儒借子夏以自重，確是特識。

葉夢得石林燕語說：

「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婉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於境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文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戶矣；又曰靈星之戶。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家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婉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

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葉氏的說法，與鄭樵六經奧論相同。惠棟九經古義駁道：「左傳哀二十九年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侯同風，故曰夏聲。』此秦風車鄰序也。太尉楊震疏云：『朝無小明之晦』此小雅小明序也。李尤漏刻錄曰：『挈壺失職，刺流在詩』此齊風東方未明序也。蔡邕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章，盡錄詩序。服楊李蔡皆東漢儒者，當時已用詩序。自范史以詩序出自衛宏，後人遂有斥詩序而用其私說者，爲辨而正之。」

後漢書儒林傳未載衛宏生卒月日；但已指出「少與鄭興，俱好古學。」「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也可以推斷衛宏的年歲比謝曼卿小與鄭興同時，是東西漢交替時期的人物。他所作的詩序，揣想在東漢中葉已經流行。服楊李蔡全生在東漢後期。他們引用衛宏作的詩序是可能的。因此惠氏的話僅足駁斥葉鄭二氏「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一語；不得證明東漢前已有詩序。

詩序自從被先儒認爲是國史或孔子子夏作的以後；就變成爲人們最崇拜的偶像！凡是讀詩經的人，都遵守序，不敢稍越雷池一步。明知詩序有與原詩不合之處亦矯揉造作，曲解詩辭，以迎合序意；於是竟把優美的詩句，弄成非驢非馬之物；今經葉鄭諸氏，將這個偶像打破。人們知道是後漢一個經生作的；自然可以脫離枷鎖，按照詩意去解詩！詩的真正美麗可以顯露於世了！我認爲葉鄭諸氏，對於詩經的貢獻不算小！曹粹中放齋詩說更指出：

「羔羊之皮，素絲五紝。毛傳謂『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如此而已。而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且以退食爲節儉，其說始於康成，毛無此意也。維鵠有巢，惟鳩居之，毛傳謂：『鳩不自爲巢，居鵠之成巢，』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鵠如鳴鳩，乃可以配焉。』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云：『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而序云：『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則與傳意先後顛倒矣。序若出於毛，亦安能自相違戾如此？要知毛傳初行之時，猶未有序也。」

曹氏根據詩序與毛傳不同之點，斷定序非毛作，較其他各說，極爲精確。可惜所舉的例子太少，當然不能服人之心，勝人之口。姚際恆詩經通論也說道：

「毛傳不釋詩序，且其言亦全不知有序者。……大抵序之首一語爲衛宏講師傳授（註八）其下宏所自爲也。……鄭風出其東門，小序謂：『閔亂思保其室家。』毛傳謂『縞衣』，男服；『綦巾』女服。願爲室家相樂。此絕不同，餘可類推。今知詩序既與子夏無干，亦與毛公不涉矣。」

邱光庭曾以出其東門詩與詩序不符，證明詩序非毛公作，推在子夏身上。今姚氏又舉出此例證明詩序，不是子夏毛公作，推在衛宏身上。二氏僅舉此孤證，只可以證明詩序不是毛公作。至於是子夏作的呢？或者是衛宏作的呢？又必須舉出其他證據，方能確定。姚氏在周頌潛篇又說道：

「此周王薦魚于宗廟之樂歌。小序謂『季冬薦魚，春獻鮒。』按月令，季冬曰：『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又季冬曰：『薦鮒于寢廟。』序全襲之爲說，則知作小序者漢人也。以秦月令釋周詩謬一。一詩當冬秋兩用謬二。上云『多魚』下二

句以六魚實之，鮪在六魚內，而云『春獻鮪』謬三。月令季冬，夏正建丑之月也。孔氏曰：『冬月魚不行，乃性定而肥，故特薦之』此釋『潛』之義。今又引及令季春薦鮪之說，則魚已不潛矣，與詩意違，謬四。」

姚氏又舉潛的一首詩來斷定詩序絕不作在漢以前，也極有道理；但恨證據單薄，實難打破年歲已久的傳說。

朱子詩序辨說講：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故此序者遂爲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小序大無義理，是後人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不能發明大旨！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以爲德廣所及。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以爲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見牛羊勿踐，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謂親睦九族。見黃耆台背，謂養老。見以祈黃耆，謂乞言。見介爾景福，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後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志，固不倫矣；况詩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寧后妃所得施於史臣者哉？桃夭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餽民，爲后妃所致。不知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邪？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爲刺。未必是言此人，必附會以爲此人。桑中之詩，止是淫者相戲之詞。豈有刺人之惡，反自陷於流蕩之中？子矜詞意輕儇，豈刺學校之詞？有女同車等皆以爲刺忽作。鄭忽不娶齊女，亦是好的意思。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爲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暴之類，皆無其實。至目爲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况其失國，正坐柔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爲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

朱子斷定詩序是衛宏作的，又指出信序之病，及詩序種種不合理之處，倍極精鑿，足使讀詩之障礙，一掃而空，豈非快事？可惜他的詩集傳，將詩旨改變爲淫者之自訴太多，致爲他人作反對的口實！未免智者千慮的一失！

最痛快的還推崔述讀風偶識，因原書較繁，只特錄取通論詩序的大意，介紹於後：

- (1)衛宏作詩序有後漢書明文可據，史漢傳記從無一言提及子夏毛公作詩序。
- (2)孔子魯人，門弟子亦多齊魯人士，齊魯兩家之詩不知有此序，何故趙人獨得之？
- (3)論語載孔子論詩皆簡要。詩序平行支蔓，不類三代之文。
- (4)詩序首尾相接，是出于一人之手。世儒分序首與序尾爲二頗非。
- (5)毛詩晚出，漢儒容易附會，故作序，以與三家詩爭勝。
- (6)詩序好強不知以爲知，致失經意。
- (7)詩序好以詩爲刺時刺君，致不顧詩之原句意義。
- (8)詩序好取左傳之事附會之。
- (9)詩序好拘泥於篇次之先後，以爲盛世之音在前，衰世之音在後。不知詩篇流傳日久，次序已變，今不惟詩之詞，而只論現行詩次，致古人受誣不少。

崔氏言辭犀利，將詩序之缺點指出無遺，足以提高人們離棄詩序，按照詩意，研究詩之

良好風氣。

四 今日擁護詩序者所提出的反擊的意見

今日又有人信從惠棟陳啟源諸氏的學說，對於葉夢得鄭樵朱熹的主張，提出反擊。例如彭醇士先生說：

- (1)衛敬仲與鄭興同事杜林受古文尚書。杜林與馬融同里。馬融為援兄子嚴之子。嚴從平陽太伯講學。林卒於建武二十三年，距融之生於建初四年，為三十三年。馬融嚴與林必常相見，與敬仲不能不識也。敬仲作詩序融不能不知。康成既受業於融之門，敬仲作詩序亦不能不知也。
- (2)賈逵父徽同敬仲，學詩於謝曼卿。逵卒於永元十三年，馬融已二十三歲。逵以家學為名儒，衛如作詩序，逵豈有不知之理，融與逵世相及也又豈有不知之理。逵與融之書雖不傳，康成豈有不知之理？然康成箋詩又注序，竟無一言及之，非甚怪歟！
- (3)范書衛傳云：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可知融毛詩傳多采衆逵之說，益證衛序融必知之。融知之，康成必知而言之。今無一言見及，范書此說不敢從。
- (4)東漢經生今古文之爭至為激烈，主奴誣譏之說，殆所難免。觀於陳元范升諸傳略可知矣。范氏世守今文，其祖寧，即傳公羊者也，是否家學承受之異則不敢臆測。

按彭先生就東漢諸儒之關係上，推論今存之詩序非出衛宏，而謂范書不可信。此種意見，宋時葉夢得已嘗提及（石林燕語）。不過是蓋然性的，而不是必然性的。因為照范書所說，可以推定衛氏詩序作在西漢末季；而鄭康成箋詩在東漢末期；相去幾達二百餘年，當然不會確認詩序是衛宏作的。就是馬融，離衛宏作序時亦遠；馬融以及賈逵等也可能知道衛作詩序；也可能不知道。衛作詩序，不可能全是自己構想；必定有採用前儒口耳相傳的成說之處。這個成說，也可能附會說是子夏留下來的。故不難信為子夏作。也可能賈馬雖知衛作詩序；但未予重視，故閉口不肯一言。因此僅依照諸儒的關係上推斷詩序是子夏作，而非衛宏所為，實覺危險。至范書儒林傳所載，係根據前人的，並非杜撰。三國時吳烏程令陸璣作毛詩草木蟲魚疏曾經講過：

「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九江謝曼卿亦善毛詩，乃為其訓。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後漢書儒林傳也講：

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

儒林傳所載的辭句與陸書相同，可見范曄的話，是有根據的；絕無排斥古文家的偏見。同時陸氏去東漢較近，他的話亦較堅實可靠。

五 我的意見

我以為詩序的作者問題，以及詩序是否可從的問題，應該從各角度來看。如果根據片面的意見，即下個完全肯定的斷語，必覺理論不周延，難以得到人們的信從。我從下列各點推論如後：

- (1)從史傳記載方面查看：陸范二氏的書，明明白白地確認毛詩序是衛宏作的，大可信賴。鄭玄說子夏作大序，子夏毛公合小序，不知根據什麼。如果真像他所說的那樣，在東漢末

期以前為什麼無人談及詩序，必須等待東漢後期才有人引用呢？尤其是孟子善言詩，而荀卿更與詩的傳受有密切的關係；為什麼他們二位都未提及詩序？董仲舒亦曾說：「詩無達詁」，這句話又應怎樣解釋？從這方面觀察，詩序的作者應該在西漢末東漢初。所以他以前，沒有人提到詩序。在他的當時，作品未流行也沒有人提到詩序；等到他死去以後，他的著作已經廣佈，就有人引用他的詩序了！衛宏正是東西漢交替時期的人物；他又從毛詩專家謝曼卿學詩。陸范二氏說詩序是衛宏作的，絕對不是隨便講的。至於他的作品，當然不能完全出於自己的杜撰，必須祖述先儒成說，再加具自己意見，那麼鄭玄誤認為子夏毛公作，唐宋的經生又承認小序首句為子夏作，亦勢有可能。

(2) 從詩序及毛傳的本身查看：我以為要解決上項問題，最根本的，必須從詩序及毛傳的本身查看。

(A) 序及傳衝突：從二者衝突上查出序非毛公作，以前邱光庭曹粹中朱鶴齡已經作了。但是一個結論可能有二個以上不同的前提；因此他們根據結論，(註九)追尋前題(註十)，三氏所得各有不同。邱朱二氏竟謬謂子夏所作。惟獨曹粹中根據序傳衝突，判斷詩序是衛宏著之竹帛，較為恰當。惜乎理由尚未詳盡，所以人們還是不信他的話。以上三氏，提出序傳衝突有五件，我根據這個方法，又推衍如後：

采蘋小序說：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按照序意，是夫人助祭的詩，所以王肅有同樣的解釋。毛傳却解釋道：

「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牲用魚，芼之蘋藻。」是毛公以此詩是嫁女時而作。顯然傳與序衝突。

靜女小序說：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毛傳却說：「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遵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

詩序以為此詩是譏刺人君的；毛傳則以為是贊美女子有德有貌的，二者恰恰相反。山有扶蘇小序說：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鄭注：「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序以為狡童狂且是指昭公所用的小人。而毛傳却說：

「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傳意是說昭公本身是個狡童。是個狂人。傳序顯然衝突。大車小序說：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序的意見明確與詩辭相反，故意掩飾說陳古刺今。那麼解詩的人，可以利用這個話，隨便解釋相反的詩辭，無怪崔述加以譏議。毛傳說：

「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可見毛以為這個大夫能聽訴訟，所以人們才不敢私奔，與詩序意正相反。盧令小序說：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毛傳却說：

「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然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悅之。」詩序以為刺詩，毛傳以為美詩，又大不相同。無衣小序說：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毛傳却說：

「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又與序，大不相同。我提出六條，加上前儒所指出的五條，全可以證明，毛氏如果作詩序，「絕不會與自己的傳衝突。詩序既然不是毛公作的，是不是子夏作的呢？我們可以依照東漢以前經傳，沒有提到詩序的話作證；又可依照詩序本身加以斷定。例如南陔及由庚等六篇亡詩序，均注明：「有其義，而亡其辭。」這明然是漢儒語氣；不是子夏。絲衣又載高子的話。高子是戰國時人。況且詩序好引左傳以附會詩意。崔述說：「三家之詩，其出也早，左傳尙未盛行，但本其師爲說。毛詩之出也晚。左傳已行於世，故得取牽合之。」他判斷詩序晚出的理由很覺正大。又詩大序「詩志之所之也」句，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句，全襲禮記樂記。漢書藝文志說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及諸子云樂事者，作成樂記。那麼樂記較晚。詩序講詩六義處襲用周禮。周禮之出不在子夏以前。周頌潛詩小序，亦襲月令。月令出於呂不韋之手，更非子夏所能逆料。至於把詩序之作者，推在國史或孔子身上，更是望風捕影之談。可見陸范二氏的說法，是極可靠的！

(B) 詩序與原詩意義不符及其不合理之處：前儒像歐陽修的詩本義，朱子詩序辦說詩集傳，姚際恆詩經通論，崔述讀風偶識，方玉潤詩經原始，對於詩序，已有詳細而又具體的指摘。茲就前儒理論尙未周密處，及未曾說及處略微提供幾點意見：

大序：朱子斷定大序是湊合前人成說而成。這話是正確的！大序最不合理的地方，如以風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將詩的主要任務一卽發抒情感，一筆抹殺。又釋雅爲政。大雅小雅卽大政小政。不但將詩解作政治的教條；並且對於大政小政亦無法區分。釋頌爲「美盛德之形容」，吾人尙可承認。若說全是「以其成功告於神明」，那就不通了！因爲現存的頌詩，却有不是告神的。序以讚美詩爲正，諷刺詩爲變。但變風變雅裏倒有讚美盛德的。關雎鵲巢同是「正道之始，王化之基」，不知從處分出王者之風，諸侯之風？我想善於解詩的子夏能有這樣主張嗎？

小序：例如漢廣是男追女而未達到目的的詩。詩序硬說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無思犯禮」。汝墳明明是女攀留丈夫不再外出的詩；硬說「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猶勉之以正。」野有死麕，明明是女子要求情人幽會時，悄悄地來。那有像詩序所說的「猶惡無禮」。因爲要是惡無禮的話，根本就嚴厲地拒絕他來。爲什麼只說：「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大車明明是說女子怕官吏來到，不敢與他情人私奔；詩序硬說譏刺今天的大夫不能聽訟。甫田明明是久別青年男女突然相見，女郎歡欣驚嘆之詩；詩序硬說大夫刺齊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完全附會左傳的話，致與原詩格格不入。綢繆明明是調笑結婚入洞房的詩；詩序硬說刺晉亂，「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葛生明明是女悼男的詩；詩序硬說刺晉獻公。無衣明明是人民愛國願欲出征的詩；詩序硬說刺秦君用兵。衡門明明是安貧樂道人所唱的詩；詩序硬說誘掖陳僖公。月出明明是描摹月下美人的詩；詩序硬說刺好色。澤陂明明是思舊的詩；詩序硬說譏刺陳靈公的淫亂。六月序說鹿鳴等詩廢，中國之道德政治全行淪喪，係附會大序所謂雅分大政小政之意。詩那是全歌咏政治道德？縱卽有關，亦應言政治道德淪喪而後詩亡。今倒因爲果，竟謂幾首詩之有無，形成政治道德的建樹及隕落，那能符合事實？楚茨，信南山，甫田，是祭祀詩，大田是咏農田的詩。瞻彼洛矣是咏周天子來臨的詩，裳裳者華是贊官吏的詩，鴻鵠是稱頌天子的詩；詩序硬說東古刺今的。車牽是燕樂新婚的詩詩；序硬說刺周幽王。魚藻是稱頌天子的詩；詩序硬說刺周幽王。采菽是詩人稱贊諸侯

朝拜天子的詩；詩序硬說刺幽王。都人士是羨慕周京人士的詩；詩序硬說刺衣服無常。隰桑明明是愛君子的詩；詩序硬說刺幽王。瓠葉明明是燕飲的詩；序也硬說刺幽王。（毛傳絕無此意。）臣工明明是戒農官的詩；而詩序硬說諸侯助祭的詩，以上所引全是序與原詩意義不符的顯明處；同時也是不合情理處。可證詩序絕對不是孔子或子夏作的，也可能不是毛公作。衛宏的嫌疑比較大。

從以上如觀點合起來看，詩序是衛宏作的傳說，尚未見虛偽。一千多年紛爭未決的訟案，或許得到公正判決的曙光！因此今天我們研究詩經當然不要被序所拘；要離開序，按照詩辭原意去探討；才能發現古詩的真正面貌，重新評判它的價值。

附 註

- (註一)朱子詩集傳，又以大序末尾「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爲小序。
- (註二)鄭樵又以每篇詩前邊的序；頭一句爲大序下文所言爲小序。程頤范處義又以序的頭一句爲小序；下文所言爲大序。或又以序的頭一句爲前序；下文所言爲後序。皆與普通說法不同。
- (註三)這是鄭玄首次說的。但也有異說見後文所引。
- (註四)鄭玄詩譜原本，至宋已亡。歐陽修得殘本，取孔穎達正義所載詩譜作「詩譜補亡」以補之。但仍有遺漏處。如沈重所云各語，仍未補入。見馬瑞辰詩譜逸文考。
- (註五)清時研詩大家如戴震（毛鄭詩攷正）及陳奐（毛詩傳疏）胡承珙（毛詩後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等，觀其零星言論全是以信詩大小序者，但無新奇意見，或無專文討論，所以我未提到他們。
- (註六)陳說雖以小序後邊的是後儒所增益；但他的書中關於詩義部份仍一宗詩序（四庫提要語）。他的態度與朱鶴齡相似。朱作毛詩通義序舉出宛丘篇序首句與毛傳異辭，似只信小序的首句；其實他的書專主小敍並指廢序之非，仍然是迷信舊說者。
- (註七)嚴意見詩緝葛覃卷耳小序下解釋，李意見毛詩集解篇首。
- (註八)原注即謝曼卿之屬。
- (註九)即序傳衝突的現象。
- (註十)即誰作詩序。

**A REVIEW OF THE PREFACES OF *THE BOOK OF
POETRY (SHIH CHING)***

Kao Pao-kua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of Poetry*, handed down by Mao Heng, there is a general preface to the whole book, called the "Great Preface," which is an explanation of the composi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unction of all the poems in this book. There is also a preface called the "Little Preface,"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poem, explaining why it was written. This "Little Preface"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at poem. Who was the author of these Prefaces? There is no annotation about their origin,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Prefaces often have no relevance to the meaning of the poetry. Therefore, in general, scholars who have studied *The Book of Poetry*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schools:

- 1. Opinions of those who upheld the Prefaces.** Some scholars, who upheld the Prefaces, thought that they were written either by Tzu-hsia, one of Confucius' disciples, and Mao Heng, or by Confucius or the historians. All of them took the Prefaces as their holy writ and dared not go against them. Whenever they came to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Little Preface" and the meaning of a poem, they tended to interpret the poem according to the Preface; with the result that many poems were spoiled by misinterpretation and lost their original beauty. Cheng Hsüan, K'ung Ying-ta, and Ch'en Ch'i-yüan belonged to this school.
- 2. Opinions of those who accepted part of the Prefaces.** Some scholars thought that the first sentence of each "Little Preface" was written by Confucius or Tzu-hsia, and the rest of it was added by the interpreters of *The Book of Poetry*. Therefore they followed the first sentence of each "Little Preface" and rejected the rest of it whenever they thought it necessary. Cheng Po-yü and Ssu Ch'e were scholars of this group.
- 3. Opinions of those who rejected the Prefaces.** Since the T'ang and the Sung Dynasties, scholars have tended to think that many of the Prefaces are meaningless. If you believed in them, you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meanings of the poems thoroughly. They have believed that the Prefaces were written by Wei Hung, a scholar of *The Book of Poetry* in the Later Han Dynasty. These scholars have insisted that Wei Hung's Prefaces should be put aside and only the poetry itself studied; otherwise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discover the true value of *The Book of Poetry*. Chü Hsi and Cheng Ch'iao are good representatives of this school.

All these disputations have remained insoluble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I now bring forward this new discussion, based on an attempt to solve the problem from all angles, for one-sided reasoning can hardly be valid. My opinions as to the solution of this problem are as follows:

1. **To investigate history and the classics.**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the Prefaces in the classics and in history books before Wei Hung. The Prefaces first appeared in books in the Later Han Dynasty. This is enough to show that the Prefaces could not have been written before Wei Hung. In addition, the "Literary Biographies" in *The Book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point out that the Prefaces were written by Wei Hung.

2. **To investigate the Prefaces and *The Book of Poetry* themselves.**

- A.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Prefaces and the annotations. Former scholars thought that the Prefaces were written by Mao Heng, and the annotations as well. But why do the annotations and the Prefaces contradict each other in some places? From this discrepancy it is easy for us to judge that the Prefaces were not written by Mao Heng. And because the Prefaces have mentioned the works of poets of the later years of the Ch'u Dynasty and the Ch'in Dynasty, they could not have been written by Tzu-hsia either.
- B. There are also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Prefaces and the poetry itself. Sometimes a Preface says that a poem is satirical but the poem reveals itself to be just the opposite. Sometimes the Prefaces are so stupid and unreasonable that they could never have been written by Tzu-hsia or Confucius, the great interpreters of poetry.

From the above discussion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Prefaces to *The Book of Poetry* were written by Wei Hung and that, because of their many misleading ideas, we would do well to ignore the Prefaces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oetry itself.